

伍
隼

鲑背集

上编◎杂文随笔卷
下编◎《红楼梦》卷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伍 隼

鲑背集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鲑背集 / 伍隼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4
ISBN 978-7-5339-4466-7

I. ①鲑… II. ①伍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 055892 号

责任编辑 陈 坚
装帧设计 水 墨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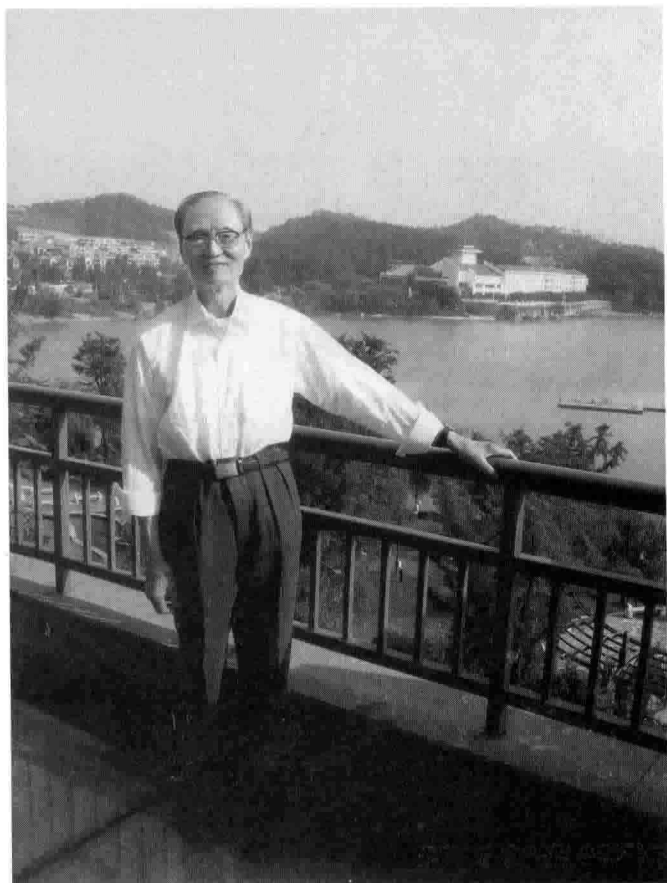
鲑背集

伍隼 著

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邮 编 310006
网 址 www.zjwycbs.cn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制 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字 数 290 千字
印 张 12.5
插 页 7
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4466-7
定 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作者近影



作者手迹

涉世情懷自率
真盧前王後幾
夢皆文章得失
等閑事且折梅
夢貽遠人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現代文學
研討會上作書之一八二年十月某日

欽瀚同志西正

唐弢



唐弢書贈七絕



1985年9月25日夜，作者与作家唐弢（中）、翻译家草婴（右）在一起。



1984年12月，作者在北京拜谒大学时代的老师、“一代词宗”夏承焘教授，祝贺他的八五寿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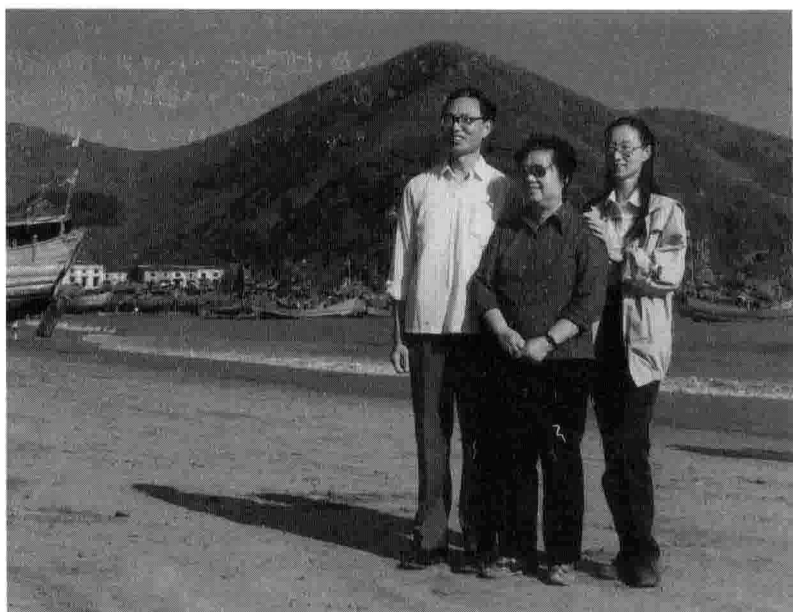
1984年10月，我国第一册《中国比较文学》专刊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这是刊物筹办期间作者与刊物主编季羨林教授（中）等人在上海宋庆龄墓前合影。



1998年与谢狱兄在竹素园合影。40年代作者在《笔垒》发表的《一元多元问题》触犯禁令，国民党某部追查作者住址，意图兴师问罪。《笔垒》主编谢狱在暗中保护了作者。他有小说《地下》问世，是一位有实力的杂文家。



1989年10月，作者应苏联作家协会之邀，出访莫斯科等地。这是作者在莫斯科红场观礼台上，参与十月革命节盛大庆典。

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。1987年10月29日，金乡全城老少欢庆建城600周年。作者一家人回归故里。算起来离别故乡已整整42个年头了。

序

李长吉有诗曰：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。岁月悠悠，不经意间我已进入九十老人的行列了。多年来涂涂抹抹，留下不少杂文、随笔，也发表了若干有关《红楼梦》的论文。现在略加删汰，裒为一集。“雪泥鸿爪”，且把它视为人生道路上留下来的一串浅浅的足印吧。

《杂文随笔卷》篇目较多，大部分为旧作。我是在1943年前后开始试写杂文并向报刊投稿的。旧中国言路逼仄，文网如毛，要写伤时骂世的杂文，一不小心就要触犯禁令。我就有过不止一次因文贾祸的经历。1944年《一元多元问题》一文引发的风波便是一例。冯友兰先生是我国知名的哲学家，但他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。40年代他鼓吹“哲学不能谈论‘一元’‘多元’‘唯心’‘唯物’”等高论，认为“哲学的形式命题就是把一句话重说一遍”。其悖谬是显而易见的。我在《东南日报》副刊《笔垒》上写短文略加评议之后，国民党刀斧手的恐吓信很快就送到报纸编辑部来了。发信者用了一个“国民党××集团军特别党部”的信封，指名索要作者住址，意图兴师问罪。编者谢狱同志知道“来者不善”，暗中掩护了我，他一面巧妙地与对方周旋，一面通知我文章已引起官方注意，要我以后写稿务必更换笔名，多用曲笔。

后来这场风波总算平息下去。类似的情况在前《浙江日报》副刊《江风》也发生过。我的一篇短文得罪了大人先生，差一点使编者莫洛兄丢掉饭碗。他临时为我换了个笔名叫“马门”，“马”“门”两字合起来是个“闯”字，是说文章闯了祸的意思。最后莫洛兄不得不与《江风》告别，一家四口，黯然离杭。虽然发生这件事有种种复杂的原因，但我的行文失慎，无疑是一根导火索。面对莫洛夫妇和他们稚弱的孩子，我的心情不能不是十分沉重的。

这以后我寄稿的范围扩大了一些。先是向唐弢同志主编的上海《文汇报》副刊《笔会》投稿，稍后又将两篇杂文寄给胡风先生。寄给胡风先生的杂文，因为他主编的杂志已经停刊，后来是由他转给冯亦代在《联合晚报》上发表的。胡风先生很热情，他有不同寻常的对于年轻作者的关爱，但我以为更难得的是，他在第一次给我复信的时候，没有止于奖勉，而是要言不烦地点出我的文章的不足之处。他是对我的杂文认真提出意见的第一人。1947年我到上海工作以后，曾到文安坊看他。他谈到他的艰难的处境。我亲眼见到他抽吸当年黄包车夫常抽的劣质纸烟，过着清苦的生活，临别时却慷慨地送给我一大叠他主编的《七月诗丛》和《七月文丛》。这里有绿原等人的诗，有路翎和贾植芳的小说，也有后来第一个站出来揭露“胡风集团”、引发惊天大案的舒芜的杂文《挂剑集》。我不禁想起了鲁迅先生“吃的是草，挤出的是牛奶”那些话，对他怀着深深的敬意。1946年冬天，我接到贾植芳的信，说自己接编《青光》，约我写稿。当时我与他并不相识，我估计是胡风先生牵的线。后来证明我的揣测是对的。从

这里也可以看到胡风先生对我的一分关爱。这种关爱是无声的。我给《青光》寄过两篇稿。一篇《幻灯与白骨》，发表在1947年元旦前后的报纸上；一篇《人和鬼》，寄出不久贾兄已卸去《青光》编务，后来收进一本名为《犯罪的功劳》的小册子里。不久贾兄被国民党当局视为“危险分子”，身陷囹圄，杳无音信。上海解放后我们久别重逢，相叙甚欢。他把他在狱中的经历写成《人的证据》，由我发表在我编的一家报纸的副刊上。

与胡风先生和贾植芳兄的一段文字交往，本来是极平常的事，但在1955年胡风案发以后，却成为我历史上一个卸不掉也解不开的沉重的包袱。我奉命调动工作，接受审查。一时家反宅乱，老母惊心。我记起屈原大夫“忠何罪以遇罚兮”那些话，进一步思索应该如何正确地解读历史。当时全国上下讨伐胡风，势如疾风骤雨。但我在内心深处相信胡风，当然也相信自己。我认为泼在胡风先生身上的污泥是一定可以涤荡干净的。当然，扭转乾坤不容易，一要时间，二要有擎天之力。后来事情果然有了转机。“四凶”覆灭之后，大地春回，我们终于等到了胡风先生沉冤大白的一天。他以诗人和文艺理论家的身份重新回到人民中间。他以刑余之身，编纂了三卷厚实的《胡风评论集》，并且写出长长的文思绵密的“后记”。我协助编辑出版了《胡风诗全编》。《全编》辑集了胡风先生从《野花与箭》开始的诗作和后来在狱中苦苦吟哦的所有旧体诗以及他的全部诗论。胡风先生给我的信已全数散佚，无从寻觅了。我在一篇题为《从为郭老选稿说开去》的文章里曾经记叙过先生复出后为诗人雷抒雁改诗

的事,现在特地收入本书,作为对于他的不能忘却的记念。

《杂文随笔卷》有关于唐弢同志的一个专辑。我从1946年向上海《文汇报·笔会》投稿开始,与他交往渐多。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度主持《文艺月报》编务,我曾两次给他寄稿。等到1983年我进浙江文艺出版社工作以后,“反客为主”,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的组稿对象了。当时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供职。他答应给我们的书稿是散文集《生命册上》和评论集《创作漫谈》(增订本)。唐弢同志逝世以后,我陆续写了《唐弢和诗》、《从书简看唐弢》和长篇悼文。我珍惜他的这份深厚情谊。这些文字,是献在他灵前的一瓣心香。

《杂文随笔卷》还收入了1989年苏联十月革命节前夕我和我的同事、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沈念驹访问莫斯科等地的见闻录。这次访问是苏联汉学家 Г.Л.里弗京(李福清)促成的。上世纪80年代我先后供职于浙江人民出版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,曾与外国文学编辑室的同志一起,在介绍俄苏文学方面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除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、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》和托尔斯泰的《舞会以后》、《克莱采奏鸣曲》等小说,以及莱蒙托夫、叶赛宁等人的诗集外,还编辑了一套“当代苏联文学丛书”,印发了吴元迈撰写的《苏联文学思潮》和贾植芳兄移译的《契诃夫手记》。这件事引起了李福清先生的注意。他在访华期间特地邀约我和念驹在他下榻的饭店见面,归国后寄来了两大册《契诃夫传》,后来又函告苏联作家协会决定正式发出邀请函,邀约我们在方便的时候访问苏联。1989年十月革命节

前夕，我们终于踏上列宁故土。我们应邀登上红场十月革命 72 周年庆祝盛典观礼台，先后到过列宁格勒和立陶宛维尔纽斯等城市，访问了托尔斯泰、普希金等作家和诗人的故居。我们与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的同行讨论了双方合作出版的问题，计划一面继续出版“当代苏联文学丛书”，将对方的优秀之作介绍给中国读者，一面将当代中国作家的精品译成俄语，送往域外。可惜后来由于苏联解体，这个愿望未能成为事实。俄罗斯历来是一片文学的沃土，我依然期待着中俄文字之交的美好的明天。

《《红楼梦》卷》收集了我发表过的五篇论文和两篇短文。我涉足“红学”，纯属偶然。十年动乱期间，经过抄家，我原有的一点图书文物扫地以尽，四壁萧然，不知何以度日。忽然“《红楼梦》应该读五遍”的传闻来了。我侥幸从友人处得到从红卫兵手里流散出来的、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八卷《脂砚斋重评〈石头记〉》庚辰本，从此俯首低眉，静心读书，偶有会意，还写下一些零零碎碎的笔记。与周汝昌、吴世昌先生讨论“金玉”之谜和“棠村小序”的文字，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起步的。周汝昌先生博览群书，能诗善赋，是一位在“红学”考证方面下过功夫的学者，可惜有时立论太偏，又不屑或不愿倾听不同的意见，难免“曲高和寡”。长期以来，他固执地认定脂砚斋和畸笏叟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化名，脂砚斋是女性，是曹雪芹的爱侣。在他看来，“一芹一脂”，其关系恰如“灾后遇合”的贾宝玉和史湘云。到《梦解红楼》一书出版的时候，他更在一篇文章里公然亮出“脂砚即湘云”的标题，把小说里虚构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的活人混为一体了。

这是背离事实也不合《红楼梦》原著的意旨的。他对于“双星”一词的理解也明显陷入误区。吴世昌先生提出的《石头记》中有“棠村小序”论，是个伪命题，我列举书证，反复地、不厌其详地表述了我的看法：所谓“棠村小序”，事实上乃是脂砚斋批语。

《〈红楼梦〉卷》还收入了一篇《关于〈秦可卿之死〉》的短文。文章重点在于批评该书编者写的“内容简介”，同时也对游谈无根的“秦学”表明了我的态度。刘心武先生是知名的小说家，他爱读《红楼梦》，有心考证，自然是好事；可惜“秦学”的诸多议论，言之无据。张友士的一帖药方居然成为宫廷斗争中的“密电码”，这已经有点匪夷所思；浪荡子贾珍被打扮成懂得真爱情的英雄式的人物，更是远离原著意旨，流于游戏笔墨了。我把《向〈红楼梦〉学习》、关于尤三姐形象改塑问题的论文和上述文字一起收入本书，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红学界朋友的教正。

书名《鲐背集》，并无深意，无非用了《尔雅》里的一句话，说明自己垂垂老矣。我自愧鄙陋，文字不耐咀嚼。这本书的出版，得到浙江文艺出版社领导人的帮助，陈坚女士又在编辑工作上竭尽心力，于此谢之。

伍隼

2015年5月5日